

雷德克科夫—布朗的后继者进行的。文化传统本身)神话、礼仪等)被看作符号系统,并且用结构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方法来研究(K·利维—斯特劳斯)。

二十世纪的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就是斯拉夫民族学(Л.奈德利,К.莫中斯基,И.茨维伊奇的综合性著作)。

亚洲国家(日本、印度、土耳其等)民族学者的数量和科学水平的大大提高,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特点。这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本国主体民族的起源、历史和文化;同时也研究小民族。

在非洲国家里,民族学者对于非洲文化史、它们的历史统一、同其他大陆文化的联系、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民间创作都非常重视(塞内加尔、尼日尔、加纳、乌干达等)。

在许多外国学者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召开专门讨论会,主办讲座,出版有关民族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书籍(英国的P·菲奥特,法国的M.戈德利,Ж.休尔—卡内利,P.马卡留斯等,美国的Y.奥斯沃特,等)。在第九次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上(1973年,芝加哥),曾就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问题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这些国家正在开展物质文化研究、绘制物质文化地图、工人和城市习俗研究、民族社会学研究、欧洲以外各国民族学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内,民族学研究计划和其他合作形式得到不断协调。

4. 革命前的俄国和苏联民族学的发展

在古俄罗斯史册、《伊戈列维军队史话》及其他文物中,含有关于东欧和西欧各民族及其语言和习俗的民族学资料。

俄罗斯去巴勒斯坦朝圣者的游记（修道院长丹尼尔等）介绍了近东各国的情况。二十世纪下半叶，阿法纳西·尼基京到印度，留下了这个国家习俗的记叙（《三海之行》）。

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十五—十六世纪扩大了地理知识的范围。十七世纪，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宦官以及随后的农民，深入西伯利亚，到达东北亚的极端；西伯利亚史册和其他资料含有关于西伯利亚各民族的资料。С. у. 列麦佐夫的著作特别重要，他绘制了第一付西伯利亚地图（《西伯利亚图》），地图上标有民族名称，并有“西伯利亚各民族的记述……”（现保存片断）。1675年，俄国驻中国使馆的头目斯帕法里，详尽地记述了这个国家的情况。

十八世纪初，Г. И. 诺维茨基写的有关汉特人的一本书（《奥斯佳克族简况》），是世界上头一批民族学专著之一。在十八世纪，组织了几次大的科学考察队，其中包括1733年至1743年的北方大型考察队，研究西伯利亚各民族是这个考察队的任务之一。西伯利亚各民族资料收集提纲，是以В. Н. 言季谢夫制订的调查表为基础的，他头一个建议按语言系属关系来进行民族分类（这个原则也是当代民族分类的基础）。Г. Ф. 米列尔是考察队陆路队的头目，他写了《西伯利亚史》这一著作；考察队参加者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留下了珍贵的《堪察加土地记游》（1775）一书。1768—1774年的学术考察队提供了大量俄国民族学资料：在参加者的著作中，有И. Ч. 列皮奥欣的《日记》，В. Ф. 祖耶夫关于奥斯佳克人和萨马耶德人的记叙、П. С. 帕拉斯有关蒙古各民族的历史民族学资料。积累起来的资料，使 Ч. Ч. 格奥尔基能够写出四卷本的综合性著作《俄国各民族记述》（1776—1780）。十八世纪末，人们对俄罗斯民族的兴趣增强了，出现了

头一批俄罗斯民俗学著作（М.Д.丘尔科夫、М.В.波波夫等）

十九世纪，俄国民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用周游世界（У.Ф.克鲁津什捷里Ю.Ф.利相斯基等），在周游期间，研究了太平洋各群岛及其土著民族的习俗。对巴西的考察（Г.兰格斯多夫），伊阿金弗·比丘林在中国、У.文纳米诺夫、Ф.П.弗兰格利等在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学的视野。在俄国，依据西伯利亚总督М.М.斯佩兰斯基的命令，收集了民间习俗资料（1819—1821）。

早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在习俗研究，特别是俄罗斯习俗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流派：主张改善民间习俗的进步的启蒙学派（Ф.Н.格林卡、Н.А.列斯图热夫）和把宗法习俗东正教理想化的反动学派（У.М.斯皮基疗夫、У.П.萨哈罗夫、А.В.捷列辛科，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民族学材料）。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材料的积累，民族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要求已经成熟；杂志中出现了“民族学”一词。1845年，根据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创议，建立了俄国地理学会，并设有民族学部（领导人是К.М.贝尔，后为Н.У.纳杰日金）。俄国民族学开始在地理科学系统中发展。民族学部向各省散发了对各地，乡村，各县进行民族学记录的提纲。在获得的手稿（近两千份）的基础上，开始发表《民族学文集》（1853—1864），后来改为《俄国地理学会民族学部论丛》。

1840—1860年代，组织了考察队（地理学会、科学院等）和个别学者周游全国各州：М.А.卡斯连收集了北方和西伯利亚民族的民族学和语言资料；А.Ф米坚多夫研究了东

西伯利亚。“文学考察队”的参加者作家和民族学家(А.Ф.的皮谢姆斯基、А.Н.奥斯特罗夫斯基、е.В.马克西莫夫)发表了游历俄国欧洲部分的材料。В.В.拉德洛夫(1860—1870)研究了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

俄罗斯民间文学搜集者В.Ч.达利亚、И.В.基列耶夫斯基、П.Н.雷布尼科夫、А.Ф.基利费尔金格、А.Н.阿法纳西耶夫等人的活动,是很有成果的。П.С.叶菲缅科、Т.И.雅库么金、И.Г.佩若夫等人收集了农民习俗的资料。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开始研究民族学的理论基础。自由资产阶级流派的代表(纳杰日金、К.Д.卡维林)把民族学的任务局限于历史认识目的;卡维林虽把民间信仰同地层加以比较。革命民主主义者(В.Г.列林斯基、А.И.赫尔岭、Н.А.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民族学是认识民族现代生活的工具。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他历史学科中把民族学提到了第一位,这种民族学提供了现代化机关“最初形式”的概念。他在赞扬摩尔根和其他进化论者的思想时,写道:“处于极其野蛮和文明之间不同发展阶段之一的每个部落,是欧洲各民族在远古时代曾经经历过的历史生活各阶段之一的代表(全集第二卷,1949年,第618页)。

然而,这种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广泛承认。在俄罗斯民族学中,遍布着神话学派的影响(阿法纳西耶夫,А.А.波捷布尼亚,Ф.И.布期拉耶夫,О.米列尔等)。

1861年农业改革之后,开始出版地方志记籍,出现了地方科学协会和地方志学会。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建于1864年)和喀山大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协会,已成为新的民族学中心。爱好者协会组织了全俄民族学展览会,其材料移交到了鲁缅采夫博物馆。

到改革时期，民族学的主要方向是研究社会和家庭习俗、农村公社、习惯法，即研究废除农奴制以后产生的问题。民间创作的研究也是有成果的（e. B. 马克西莫夫、П. B. 舍伊恩、E. p. 罗曼诺夫、B. H. 多布罗沃利斯基、П. П. 丘宾斯基等）。在西伯利亚，地方研究者（Д班扎罗夫、Г. 齐比科夫）和被流放的革命者（Ч. А. 胡佳科夫、B. Г. 鲍戈罗夫、Л. Я. 什捷恩列尔格、B. Ч. 约赫利松等）进行了大量的收集资料的科学工作。

自1870年代起，扩大了对外国的研究（H. M. 普尔热瓦利斯基、Г. H. 波塔宁等游历中央亚细亚，Ч. П. 米纳耶夫去印度，B. 尤恩凯尔去非洲）。毕生从事大洋洲居民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工作的H. H. 米克卢霍—马克莱的研究，在民族学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进化学派是民族学的主要流派，具著名代表有：M. M. 科瓦列夫斯基、哈鲁津内伊一家、什捷里列尔格和Д. H. 阿努钦，后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了综合方法（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材料）。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增大。科瓦列夫斯基就接受了它的影响，他把父系家庭公社当作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形式之一进行了研究（恩格斯强调了这个发现的重要性）。H. Ч. 齐列尔在《原始经济文化概要》（1883）一书中，分析了原始集体的生产关系。

自十九世纪末起，除民俗学和社会家庭习俗之外，开始认真研究物质文化（居民点、服饰、工具、行业），民族学博物馆的出现和扩大是与此相关的。科学院最大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鲁缅采夫博物馆（民族学文物收藏家——B C 米尔列尔），加强了科学活动。1902年，建立了俄罗斯博物馆民族学部（以Д·А·克列缅茨为首）。出现了民族学

期刊：《民族学评论》（自1889）、《新古董》（自1890）等。B. H捷尼舍夫（1898—1901）大公的私人“民族学处”收集了许多材料。制订了研究民俗学（Б·М·和Ю·М索科洛夫、А·Н·维谢洛夫斯基、米尔列尔）和民间音乐（Е·Э·利尼奥娃把音调和歌词记录在一起）的科学原则。Д·А·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С·И·塔涅耶夫等，参加了1901年建立的民族学委员会博物馆的工作。

从二十世纪初起，表明科学民主化的普及出版物数量大大增加。这些普及读物的作者是Е·Ч·沃多沃佐娜、П·А科罗普切夫斯基、Я·А·别尔林等。出现了集体的出版物和普及丛书：《地球上的民族》（第1—4卷，（1903—1911）、《俄国的民族》（1905）等、多卷本的地理书《俄国》（В·Д·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主编，1899—1914）。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民族学总的状况在理论上是复杂的。感觉到必须有新的研究和综合的方法（А·Н·马克西莫夫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于以革命前民族学的人道主义和民主遗产为基础的民族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同苏联多民族国家实际任务的紧密联系，在革命后的民族学研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族州和专区的建立、落后民族文化习俗的改革，要求深入地研究这些民族。为此，早在1917年就建立了俄国和邻国居民部落成分研究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1930年建立了苏联民族研究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直属极北地区各部族促进委员会（1924—1935）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鲍戈拉兹是该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民族学》杂志创刊（自1931改为《苏联民族学》。为了协调民族学与相邻学科的工作，1933年于列宁格勒建立了人

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1937年在这个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

在革命后的民族学研究中，形成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原始社会和文化的趋向（И. Ч. 库什涅尔，В. К. 尼科利斯基）。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苏联民族学和多数人文科学中，开展了一场旨在克服理论上的分歧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讨论（1929年的民族学会议、1932年的考古学民族学会议（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社会制度和落后民族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民族文化及其阶级内容的著作，是苏联民族学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三十年代的民族学著作，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民族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制度、各种宗法的和宗法封建的关系问题上。扩大了原始公社制度、母权制、军事民主等的历史比较研究。（Е. Г. 佐洛塔疗夫、С. П. 托尔斯托夫等）。根据什捷里别尔洛和鲍戈拉兹的创议，在极北地区收集文物资料的活动具有广阔规模（Е. Ю. 克列伊诺维奇，А. А. 波波夫，Г. М. 瓦西列维奇等）。形成了民族学中的苏维埃学派。

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民族学研究既在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展开，也在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许多科学机关、高等院校、博物馆等进行。研究的主要方向有两个：原始社会史问题和世界民族的历史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共同进行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世界观意义。在科学研究中，拥有说明原始公社制度的历史普遍性的广泛材料，证明了双重组织是普遍存在的（佐洛塔疗夫）。较后的原始公社制度形式的研究，有了重大的进展。确定了父系民族的复杂结构，开始研究大

家庭和小家庭的历史类型。依据现代民族学材料，明确了原始社会家庭婚姻关系发展的图景，从中排除了摩尔根从类型上构拟的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Д.А.奥利杰罗格等）。原始社会分期、氏族和公社的相互关系、婚姻关系早期形式的性质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托尔斯托夫H.A.布季诺夫，М.О.科斯文，Ю.П.彼得罗娃·阿维尔凯耶娃，А.Ч.别尔希茨，Ю.Ч.谢苗诺夫等）。

苏联民族学家同考古学和人类学家共同进行的民族史问题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综合观点，大大推进了苏联各民族起源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西欧、美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正在进行。民族史问题的研究表明，一切现代民族都是由不同的民族成分形成的；构成是混合的，从而推翻了关于个别民族的“种族纯洁性”、“民族排外性”的思想。

对于苏联和国外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即农业技术、居民点、住宅—服饰的研究，非常重视（Е.Э.布洛姆克维斯特，М.В.维托夫，Н.Ч.列别杰夫，Е.Н.斯图杰涅茨卡娅，Г.С.马斯洛娃，Г.С.奇塔娅等）。为了综合一切已经积累起来的有苏联各民族物质文化史的资料，绘制了专门的历史民族学区域地图：发表了西伯利亚各民族地图集（1961）和《俄罗斯人》地图集（上、下册，1967—1970）。

民间创作，如造型艺术（С.В.伊万诺夫，В.Н.切尔涅佐夫，С.Ч.瓦英什顿等），民间文学（П.Г.鲍加蒂方夫，Э.В.波麦兰佐娃，В.И.普罗普等）的研究大大地扩大了。宗教史及其起源和早期形式的研究正在进行（С.А.托卡列夫，А.Ф.阿尼西莫夫，Б.Ч.沙列夫斯卡娅等）。

利用相邻学科的资料对各民族进行综合研究，是历史民

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西伯利亚许多过去无文字民族的历史研究，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瓦西利耶维奇，Л.П.波塔波夫，Ч.С.古尔维奇等）。在东斯拉夫各民族，即俄罗斯民族（В.В.鲍格丹诺夫，Д.К.泽列宁，В.Ю.克鲁皮扬斯卡娅，Б.А.库夫京，Л.М.萨布罗娃，К.В.切斯托夫等）、乌克兰民族（К.Г.古斯利斯蒂Г., Е.斯捷利马赫，В.Ф.戈尔连科等）、白俄罗斯民族（В.К.邦达尔奇克，М.Я.格林布拉特，Л.А.莫尔恰诺娃等）、南高加索民族（В.В.巴尔达维利泽，Д.С.瓦尔杜緬，И.Д.伊纳尔-伊帕，С.Д.利西齐安，А.Ч.罗巴基泽，Р.Л.哈拉泽，奇塔娅等）、北高加索民族（В.К.加尔达诺夫，Г.А.科基耶夫，Л.И.拉弗罗夫等）、中亚民族（М.С.安德列耶夫，Н.А.基斯里亚科夫，С.М.阿布拉姆宗，Т.А.日丹科，О.А.苏哈列娃等）、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В.е.日列纳斯，М.К.斯捷别尔曼尼斯，Г.Н.斯特罗德，Л.Н.捷连季耶娃等）、伏尔加沿岸各民族（В.Н.别利采尔，Н.И.沃罗比约夫，К.И.卡兹洛娃，Т.А.克柳科娃，Р.Г.库泽耶夫等）的民族研究，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

研究苏联当代的民族过程和文化习俗过程，在苏联民族学家的活动中占有一个中心的地位。开展了民族过程的民族社会学研究（Ю.В.阿鲁丘尼扬，Л.М.德罗比热娃，В.В.皮麦诺夫等）。族际接近过程和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全苏文化特征形成的研究已经开始。

对国外各民族进行了一系列历史民族学研究。它们文化的类型比较研究有了一个开端（托卡列夫，О.А.甘茨卡娅，Ч.Н.格罗兹多娃等）；它们民族史的研究正在进行（е.Р.斯米尔诺夫，奥利杰罗格，С.А.阿鲁丘诺夫，Р.Ф.伊特斯

等)。正在研究亚洲、大洋洲(Н.Н.切鲍克萨罗夫, П.Ч.普奇科夫, М.В.克柳科夫)、非洲(奥利杰罗格, Ч.Ч.波捷欣, С.Р.斯米尔诺夫, Р.Н.伊斯马格诺娃等)的现代民族过程和文化习俗过程。美国、加拿大、拉美各国现代民族过程的研究已经开始(С.А.戈尼昂斯基, М.Я.别尔齐娜, И.А.鲍基娜等)。

本国民族学史的研究和国外民族学的批判分析在继续进行。苏联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揭露种族主义、新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工作,有着巨大的科学和政治意义(Ч.Р.格里古列维奇, Г.Ф.杰别茨, М.Ф.涅斯图尔赫, Э.П.尼托布尔格, Я.Я.罗金斯基等)。十三卷(十八册)的《世界民族》丛书(С.П.托尔斯托夫主编, 1954—1966)、《普通民族学概论》(第1—5卷, 1957—1968)的出版,是苏联民族学家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苏联民族学的国际威望提高了,苏联民族学家参加了国际会议和国际讨论会;外国学者为了咨询和实习,经常来苏联。苏联民族学家的许多著作译成了外文。

苏联民族学在完成认识和思想职能的同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目的在解决促进苏联各民族接近的、具有世界观和现实意义的迫切问题。

在民族学方面的科学工作,是由专门的科学机关,即从事科研的民族学研究所(在苏联,在科学系统内——Н.Н.米克卢霍-马克莱民族学研究所等)、大学、博物馆(包括民族学博物馆),以及多数国家都有的民族学学会进行的。收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民族学杂志和其他专门的出版物发表。1948年,建立了在自主的活动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联系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自1934年起)按时召开国际会议。

资料来源:(略)